



引用格式:吕晓洁. 河南当代文学审视[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3): 71-78.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71-08

河南当代文学审视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He'nan province

吕晓洁

LV Xiaojie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中原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深厚的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又不断地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而引人瞩目的中原乡土世界。与此同时,一些地域因素对于河南作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使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单向度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渐成风景的河南女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河南男作家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正处于巨变中的中原风貌,但因在历史积淀与生活磨砺方面存在某些欠缺,使得这些作品少了些厚重感。继续着力开发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是河南文学在新时代实现突破与超越的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

河南文学;
地域视阈;
传统经验;
反思;
超越

[收稿日期] 2018-05-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82400410259)

[作者简介] 吕晓洁(1972—),女,河南省泌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河南文学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河南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一直居主导地位,这与中原地区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明有密切关系。从20世纪初新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等对中原农民苦难生活的书写,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等对中原农村现状的描绘,到70年代李準、段荃法、张有德等对中原农村新生活的书写,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对新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乡土文学都居于重心。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河南作家以空前的阵容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宗璞的《东藏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分别获得矛盾文学奖,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改编成电影后,在全国反响很大,代表了河南当代文学创作的高水准。但近年来,河南文学中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渐少,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更少。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加速,激起社会巨变,“文变染乎世情”,河南文学如何应对这个特殊时代,再度创造辉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以反思精神审视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深层的影响因素,探寻新时期河南文学实现超越、更好地向前发展的路径,以为推动河南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河南文学与地域资源

地域是物质与精神交融的空间,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已被大批优秀作品证实和众多学者认可。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1]认为,风土与居民有密切的关系,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不同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这说明,一个地方的风土对作家创作、对文学特色与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潜在影响。严家

炎也指出,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作家的性格、思维、艺术特征,而且对于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学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中原这块特殊的地域孕育了特殊的中原民风民情,也形成了特殊的中原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必然会影响河南作家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旨趣。20世纪河南新文学就是在中原文化的裂变中生成的,从早期的尚钺、徐玉诺、冯沅君等,到三四十年代的师陀、姚雪垠,70年代的李準、段荃法、张有德等,再到新时期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痕迹,无论是作品中的地理风貌,还是对于中原人性格的揭示,以及作品中的精神内涵,都浸透了中原文化的汁液。

中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自然地理、物质元素、精神维度等。从地理上看,中原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四周环山,中部是广阔的平原,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生存。因此,中原大地很早就有了人类,发展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农耕文明发达。距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稻谷遗迹,30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农事活动的记载,并有稷、黍、麦、稻等农作物名字。中原因其位置优越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定都之所。《史记·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3]《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4]这里所说的伊、洛、河、济、伊阙等地就在今天的中原地区。从夏商到北宋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原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对中原人文化性格的养成有深深的影响,他们有自

信、乐观的一面,也有自大、保守的一面。此外,中原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给中原人带来了无数灾难,因此,中原人也养成了善于在夹缝中求生的韧性与斗争精神,这些在河南文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从思想传统上看,老子、庄子皆为中原人士,孔子虽然生于山东,但传播其思想的主要地方在河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相互交融构架起了儒道相济的中原文化主干。中原人深受儒道文化熏陶,既能以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张一弓《远去的驿站》中的那群知识分子,满怀报国之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拍案而起,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运动之中,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仅凭自身力量无力回天的大挫折、大厄运面前,能以老子的无为而有为、顺应自然而自释,如张宇《活鬼》中的侯七。再者,中原深厚的思想文化养成了中原人尊礼守法、坚韧顽强、勇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例如,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小说中所展示的南阳人的纯朴仁爱、坚守信念。其长篇小说《第十二幕》中的尚家几代人百折不挠,历经战乱、匪祸、运动、腐败等重重磨难,每一次虽都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尚家人坚守造出最美绸缎的理想并不断为之奋斗,为中国民族丝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準在其《黄河东流去》中描写了黄河两岸人民在国民党炸开黄河大堤使他们遭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之际,不是消极认命,而是自强自立,顽强求生,并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再难不失人格,再苦不忘国耻,这正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儒家精神的生动诠释。

中原传统思想深厚的另一面是受封建思想钳制的时间太久,在中原人的性格特征上留下了唯上、保守、好斗等不好的烙印。新时期以

来,河南作家表现出集体反思的精神,面向新的历史时代进行了深度思考,他们反思中原发展的历史、中原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这些文化根源对中原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等,表现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与拯救情怀。其中,乔典运的系列作品《冷惊》《满票》《村魂》《乡醉》《问天》等对中原人的顽固、好斗等文化性格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对中原农民凡事唯上、盲目跟风等性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作品对南阳人的保守与落后进行了真实的描绘。此外,李佩甫、阎连科等作家在作品中对河南人的性格也都进行了集中的观察与思考。

二、乡土构建与视域局限

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得天独厚的文化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又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的乡土世界。然而一些地域因素给河南作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与制约。

1. 创作视野的限制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灾难重重,给河南作家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河南作家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乡土世界。例如,姚雪垠《长夜》里的中原是一个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世界;李準《黄河东流去》里的中原大地横遭黄水灾害,黄河两岸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状目不忍睹;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中原大地饿殍遍地;阎连科《丁庄梦》中的丁庄村艾兹病蔓延,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刘庆邦的煤矿系列作品中处处是悲苦与无助,农村系列作品中处处是凄凉与沧桑。

河南作家的写作是真诚的,他们具有最深的忧患意识,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爱其厚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盼其振兴。刘震云在

创作《温故一九四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阎连科的《丁庄梦》是根据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而写成的,作者曾在三年里六次到该村了解疫情,收集资料,小说虽然有文学上的虚构成分,但大量细节近于写实,其小说集《情感狱》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对于中原乡村的权力与宗族纠葛、乡村权力带给农民的苦难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刘庆邦曾在煤矿工作多年,其煤矿系列小说多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国内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涉及的原因有物质资源匮乏的自然因素,有极左路线、权力压迫等政治因素,有封建思想残留的文化根源,也有源自人性深处的一些缺陷,反思较为全面、深入。河南作家对故乡的苦难、故乡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能进行深刻的剖析,归根结底是源于一种担当精神,一种怀有殷切希望的拯救精神,批判的目的在于重新建构美好的中原乡土世界和曾一度失去的中原人的健康人性。

多数河南作家由于过于执著于苦难世界的描写,从而囿于一个封闭的“苦难世界”而无法自拔,影响了其描绘生活的广度,导致了其创作题材的狭窄、创作主题的单一,影响了其对中原乡土精神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比如,几乎每个河南作家都集中描写了权力与苦难问题,尤其以阎连科的作品最为突出,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一部苦难史。如果说其早期的《情感狱》等作品对人类苦难的描写是真实而令人震撼的话,那么到了中后期的《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年月日》等作品,其对苦难的描写则成了魔幻故事的点缀与装饰。这样一来,作品中的苦难很有可能沦为可供观瞻的艺术品,从而失去其本来应有的人文情怀。

苦难是古今中外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早已开始了对于苦难

的书写。此后,苦难书写一直贯穿于中西文学作品。就西方文学作品来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几乎所有的古典大师的作品都直接而深刻地书写了苦难。就中国文学来说,从《伐檀》到《史记》《窦娥冤》《红楼梦》,直到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深深的苦难意识,这些经典作品也因具有人类的苦难意识而震撼人心。

中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比别的区域有更多的苦难,如20世纪初的兵祸、匪乱,1930年代的黄河决堤,1940年代的水灾与蝗灾,1950年代末的“信阳事件”等。这些灾难记忆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反映到其作品中去,从而使其作品有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品质。但过分执着于这些描写,囿于其中而无法超越,容易使作品变成一种精致的艺术雕刻,难免沦为展览式的文本,从而削弱乃至失去了作品的思想批判力度。着力表现苦难的村庄、苦难的人民、苦难的乡土没错,但如果一味沉溺于这些表现,就会造成题材与主题上的自我复制。

对于乡村政治的集中描写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文化十分发达,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沉淀在中原人的心灵深处,对中原人影响极大。中原乡村的政治权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因此也成为了河南当代作家描写的一个中心。作家过多地对于权力经营的精细描写,如《情感狱》《故乡天下黄花》《羊的门》等,对权力的角逐倾轧、复杂的权谋之术、深谋的心计、高超的手腕等的描写,反而遮蔽了其对于权力的批判。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对于目前乡村文化的复杂面目揭示得比较真实深刻,颇具时代气息。作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候选人在竞争中如何勾心斗角,如何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如何利用小利诱惑农民,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票,

这些成了小说的核心情节,这种过分投入的戏谑态度容易把读者引入“看热闹”的迷途。又如,李佩甫《羊的门》中对于权力的描写,作者对呼天成权力运作的描写表现出沉迷的一面,作品中一旦涉及呼天成如何驾驭人心、利用他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与呼市市长如何斗法等方面,作者的笔触就显得特别活跃,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作者设置的权力执掌者的智谋经营之中,其结果是权力成了一门可供玩赏的艺术,很有可能落入文化消费的圈套,从而影响了作品的精神境界。

2. 创作模式的限制

河南作家就单独个体来说,在创作题材或艺术表现上存在着模式化问题。例如,乔典运叙述一件生活小事,常常是制造出人意料结局,从中揭示中原农民的奴性,缺少自我创新;阎连科小说始终未能跳出乡村苦难这一主题;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一度沉迷于狂欢化叙事,造成语言的自我膨胀,其《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等作品使很多读者不忍卒读,且引来颇多质疑;刘庆邦的小说存在苦难复制现象,对物质性的苦难描写较多,对精神性的苦难描写较少,使作品停留于表层的历史记录,忽略了对苦难背后的深层东西的考量。

古今中外,凡属经典文学作品,必然凝铸着一些令人为之震撼、刻骨铭心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而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就需要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乡土经验融入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去,扎根生活深处,把握时代精神,关照人类生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精神、18世纪的启蒙精神、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等,至今仍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慷慨悲壮的秦汉文学精神,狂放洒脱的魏晋文学精神,丰富激昂、刚勇进取的盛唐文学精神,求变求新的近代文学精神,以及启蒙、激进的

“五四”文学精神等,至今仍使这些作品闪耀于文坛之上,成为文学作品的典范。河南作家应该从中受到启发。

三、乡土风景与代际差异、性别差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当代作家尤其是像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有在中原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于那个时代的乡村记忆比较深刻,他们的乡土经验建立在过去的乡村生活经验之上,而对于当下的乡村生活则有些隔膜。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新时期以前的乡村世界。目前,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下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矛盾与困惑,等等,他们关注得较少。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现代化不断加深,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如何回到乡村中去表达新时期的乡土精神,这是目前包括河南文学在内的我国乡土小说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邵丽、乔叶、傅爱毛、蓝蓝、梁鸿等河南一些女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并逐渐引起文坛注意。例如,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指甲花开》《锈锄头》《最慢的是活着》,傅爱毛的《嫁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描写的更多是当下的中原、正在发生着剧变的中原,表达了对历史转型中的乡土中原的深切关注,填补了河南乡土文学的一段空白。

河南女作家大多出生于1970年代,与上一代作家相比有着不同的乡村经验和文学理念,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她们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以往作家笔下的乡村世界,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融

合问题、农村人进城问题、农村女性出路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与中国乡村共时性同步发生着的一切。这些女作家以敏锐的乡土感知、独具的艺术手法、细腻的情感叙事,拓宽了河南文学的叙事空间,丰富了河南文学的叙事内涵,为河南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她们打破了以往河南男性作家常用的小说叙事方式,不再把革命、历史、家族等宏大叙事作为主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乡村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描绘城乡正在发生着的变革,重在展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思想深处发生的变化;书写对象由过去乡村生活扩展到了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乡村发展问题;书写空间由乡村扩展到城乡结合地带、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居民等;叙事时间由“过去时”转到了“现在进行时”。施战军曾指出,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5]河南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面对发生了变化了的新乡土社会做出的探索。比如,邵丽的著名中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基于城乡文化的差异及其带给人们的精神上的限制,而对城乡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的集中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城乡文化的对立与融合问题;其另一篇小说《明惠的圣诞》,是基于近年来农村女青年不断涌向城市后在城市的境遇问题而写成的,通过对“明惠”这个女孩的城市梦想的追逐与破灭的描写,从理论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追问。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锈锄头》等作品对乡下土地日益缩减、农村人进城问题进行了书写;《盖楼记》揭示了乡村土地征用拆迁问题。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对于目前乡村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如乡村文化的颓败、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留守妇女问题、失学儿童问题等,都进行了真实的描写。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乡村的精神面貌。

但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生活积淀,以及对于历史、文化、人性更为深刻而宽广的认识,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具有厚重感、历史感的长篇作品不多。她们对于目前年轻的乡村女性出路问题的探讨,值得重视。一些很早辍学回家和一些虽坚持读到高中而在高考落榜后的乡村女孩外出打工是其必然选择,但她们进入城市之后的路在何方,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和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对此进行了深思。但由于作者视野的局限、对于问题本质把握不够,这种探讨尚欠深入。乡村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历史关口,面对日益全球化、都市化、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乡土小说如何更好地面对现实而深入写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新时代河南文学实现超越的路径

河南文学史上不乏有突出影响的作家,如近代的师陀、姚雪垠、李準等,1990年代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成绩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颇具影响力。新世纪以来,河南文学前进步伐不大,虽时有新作出现,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远不如前。河南文学要实现超越,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反思自身,在现实中扎根,在传统中超越

刘增杰^[6]曾指出,中原文化要进步,当务之急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放宽眼界,借鉴吸收世界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有益经验,首先实现自我超越,然后才能实现整体超越,换一种视角会挣脱权力文化与苦难乡村的苑囿,发现更多不同的表现领域。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也说过:“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他认识

到的人类情感。”^[7]这种人类情感可打破个人生活的狭隘视野,超越窄小、肤浅,通往博大、深刻。当作家清醒而自觉地表现人类情感时,他的痛苦与欢乐就会超越一己之欲,变成时代、社会、人类情感的代表,因为他的情感已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土壤之中。

其实一些作家也有过自省与警觉,试图自我脱变。比如阎连科,其“耙耧山系列”早期作品大多打上了政治苦难与贫困的物质条件所造成的苦难的印记,如《情感狱》《受活》《丁庄梦》等涉及的苦难,多源自乡村政治未脱尽的封建色彩或物质匮乏造成的苦难。其后来创作的作品如《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则把目光转向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人对自然的抗争、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问题等,表现出了强烈的哲理意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其对人生、历史努力探索之后取得的实绩。该作品不再执迷于“故乡系列”作品那种戏谑与解构的态度,不再玩味文字游戏,而是返身于纯朴的故乡大地,写出了一曲东方农民的“百年孤独”之歌。作者语言朴拙,叙述极富耐心,甚至有点“絮絮叨叨”,像一个岁月老人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从容不迫地讲述着村庄所发生的一切。无疑,像莫言向民间的大撤退一样,作者也在返回民间,返回中国小说的传统,这是一次成功的“返乡”。与其“故乡系列”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更具精神内涵,更具人类意识,也因此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一部作品如果能从具体的人或物中发现某种生存普遍性,如一个特殊时代的生存普遍性、一个地域的生存普遍性、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生存的普遍性,那么该作品就容易显出超越意义。南非作家戈迪默曾说:“对经验的改造仍是作家首要的基本的姿态。作家的想象力大大拓宽、扩展了有限的经验范畴,有如此的经验才能得到提炼升华,充分展露其意义和重要性。”^[8]

作家仅有感受与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想象熔化改造具体事实、个人经验、个体感受,加以重组再建,用想象拓宽经验、扩展感受,升华事件的深层意蕴,走出狭隘的经验圈子,超越一己感受,向更宏大、更深邃的世界进发。李锐在谈到创作时说:“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作品再说:这是写的农村题材,是写农民的小说。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当吕梁山作为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它应当具有无可置疑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不应当仅仅是我渴盼辉煌到过的一座山脉的名字,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甚至不应当仅仅是中国的一座山。所谓‘天地广大美而不言’——这高山无语的境界是一种大境界,令人心向往之!”^[9]

与新时代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同步,深入城乡内部,体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的新的渴求,进入他们面前的新困境,这是一条可取之路。学界有中国文学存在走向世界的焦虑之说,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河南文学。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者深入乡村,了解乡村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写出时代巨变中的真实的乡村,给人们展现出一个共时性发生着的真实的乡土世界。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作家只有沉入社会底层,进行敏锐观察与感知,怀着对人类的无限热爱、对生命的深情眷顾,对这个时代里的自我灵魂进行剖析与自省,展现知识分子的关怀与担当,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2. 深厚的中原传统文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其渊源之深远、思想之

博大,只有深入体会才能掌握其精髓,而一旦掌握了其精髓,就会激发更多的灵感,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从而达到更高的写作境界。比如道家文化,并不是一句“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就能包括了,而是包含了无尽的奥妙。道家文化在几千年前就具有了人类眼光和人类的生存意识。道家知识分子经由体验进入本质,参悟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洞见了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互生互动、相通相融,看破了“一”“道”“虚”“静”等宇宙生存的至博至高境界。道家发现生命个体只有生存其中、体验于其中,又能巍巍然超乎其上(不是凌驾于其上),才能达到自然与人的真正相知相荣。正是因为他们把这样的超越境界随时融通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才实现了道家心目中的人、物、过往、未来、自然、天地、机体、精神的浑然一体。这是一种至高的生态伦理,它既不以自我或人类为中心,又不以自然神性为崇拜对象,而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和合”关系。在目前商业文化充斥一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双重恶化的情况下,这些生态思想对于河南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态文学是目前文坛较为活跃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很多生态文学作品浅尝辄止。由于缺乏深刻的生态思想,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与科技的发展缺乏成熟的思考,难以提出可行的见解,因此出现创作上的审美追求取向游移不定,导致一些作品的情节僵化或一些拯救方式的悬幻化。目前河南还没有真正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可以由此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五、结语

中原文化既是一个关乎地理的概念,也是

一个关乎时间的概念,它有一个不断发展、丰富、自我更新的过程。新时代,中原文化应该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内涵。1990年代始,文学置身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化浪潮给文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荡。进入新时代,以网络、影视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浪潮,对文学形成了新一轮的冲击。外部环境因素也给近年来的河南文学带来一定困扰。河南文学应重新启用和开发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如此方有望实现突破与超越。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65.
- [2] 严家炎.“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总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
- [3] 司马迁.史记(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474.
- [4] 左丘明.国语[M].黄建国,张玖青,注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10.
- [5] 施战军.生活与心灵:困难的探索——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J].人民文学,2006(1):125.
- [6] 刘增杰.路上——我的学术经历[J].东方论坛,2005(6):47.
- [7] 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5.
- [8] 毛信德,李孝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精品[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272.
- [9] 李锐.拒绝合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3.